

Dialgue
Transcultural

跨文化

文化对话



寻求跨文化对话的话语
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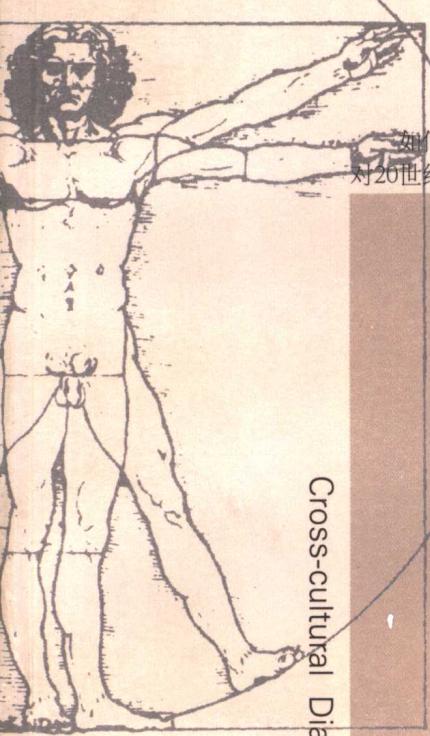
如何面对人类的痛苦
对20世纪我们应记住什么

Cross-cultural Dialogues

1

上海文化出版社

文化的多元共处
生物学发展与伦理问题
电脑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跨

文化对话

1

主编
[中] 乐黛云
[法] 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国强
封面设计：陆震伟

跨文化对话(一) 主编 [中]乐黛云 [法]李比雄
执行主编 钱林森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6×939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167,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ISBN 7-80646-009-8/1·238 定 价：19.00 元

《跨文化对话》丛书

学术委员会成员
(以音序排列)

中国委员

丁光训 南京大学前副校长,金陵神学院名誉院长,宗教学家,教授

丁石孙 北京大学前校长,数学家,教授

季羡林 北京大学前副校长,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印度学专家,语言学家,教授

匡亚明 南京大学前校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前组长,孔子基金会前会长,教育家,哲学家

李慎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国际问题专家,教授

厉以宁 北京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家,教授

庞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教授

汤一介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家,教授

王元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张岱年 中国孔子学会会长,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张 维 清华大学前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工程学家,教授

西方委员

Mike Cooley 英国布莱顿大学技术科学委员会主席
Antoine Danchin 法国巴斯德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生物学教授
Umberto Eco 意大利波洛那大学哲学系教授,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哲学家
Xavier le Pichon 法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地质地理系主任、教授
Jacques Louis Lions 法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数学系主任、教授
Carmelo Lison Tolosana 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孔普鲁登塞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
Alain Rey 法国词典学家,国际词典学联合会主席

《跨文化对话》丛书

编辑委员会成员

主编 乐黛云教授 (中国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北京 100871,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
文化研究所

电话与传真(10)62752964

E - MAIL: Tyjydy@pku.edu.cn

主编 李比雄教授 (Alain Le Pichon, 法国跨文化研究院)

通讯地址: Universite de Cergy – Pontoise, 33bd du port 95011
Cergy – Pontoise

电话:33—1—34256166

传真:33—1—34256267

E - MAIL: lepichon@paris.u-cergy.fr

执行主编 钱林森教授 (中国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南京 210093,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
化研究所

电话:(25)3594733
传真:(25)3309703
E - MAIL:lsqian@nju.edu.cn

执行副主编 杨正润教授 (中国南京大学)

通讯地址:中国 南京 210093,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电话:(25)3593917
传真:(25)3309703
E - MAIL:zryang@nju.edu.cn

执行副主编 郝铭鉴编审 (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21)64372608
传真:(21)64332019
E - MAIL:cslcm@public.1.sta.net.cn

编委会巴黎联络处主任 金丝燕博士、副教授 (Dr. Jin Siyan, 法国阿尔瓦德大学)

通讯地址:15 Rue Victor Cousin, 75005 Paris, France
电话:33—1—56240483
传真:33—1—56240921

执行编辑 李国强副编审 (上海文化出版社)

通讯地址:中国 上海 200020,绍兴路 74 号
电话:(21)64372608
传真:(21)64332019
E - MAIL: cslcm@public.1.sta.net.cn

本辑作者介绍

乐黛云 (中国)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阿兰·李比雄 Alain le Pichon (法国)

法国跨文化研究院院长, 塞尔日-蓬图瓦兹大学人类学教授

汤一介 (中国)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 教授, 中国文化书院院长

弗朗索瓦·于连 François Jullien (法国)

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系主任, 教授

安托瓦纳·唐善 Antoine Danchin (法国)

巴斯德学院科学委员会主席, 生物学教授

皮埃尔·亨利·普勒洛 Pierre Henry Prelot (法国)

塞尔日-蓬图瓦兹大学副校长, 法学系主任, 法学教授

孙晓理 (中国)

北京大学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物理学博士

刘华杰 (中国)

北京大学自然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麦克·库利 Mike Cooley (英国)
布莱顿大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艾克沙维·李比雄 Xavier le Pichon (法国)
法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地质地理
系主任教授

舒衡哲 Vera Shwarcz (美国)
威士里安大学教授,东方研究所所长

恩贝托·埃柯 Umberto Eco (意大利)
波洛那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方正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物理学博士

阿兰·雷 Alain Rey (法国)
词典学家,国际词典学联合会主席

张世英 (中国)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比较哲学研究所所长

庞朴 (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林赛·沃特斯 Lindsay Walters (美国)
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主任

王宾 (中国)
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

瓦拉德·古德齐 Wlad Godzich (瑞士)
日内瓦大学教授

钱林森 (中国)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教
授

● 目录

卷头语

- 寻求跨文化对话的话语 乐黛云(1)
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法]阿兰·李比雄(4)

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讨论

♣ 文化冲突与文化对话

- 文化的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 汤一介(8)
更新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重估中国文化传统
对人的认识
[法]弗朗索瓦·于连/[法]阿兰·李比雄(14)

♣ 生物学发展与伦理问题

- 由生物学论及伦理道德的几个问题 [法]安托瓦纳·唐善(28)
法国的生物伦理与生物法
[法]皮埃尔·亨利·普勒洛(40)

♣ 电脑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 计算机信息网络给我们带来什么? 孙晓理 刘华杰(46)
科学与最优之路 [英]麦克·库利(56)

学者对话

- 如何面对人类的痛苦? ——今天人类的痛苦和二千年前相比
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

=====

汤一介/[法]艾克沙维·李比雄(64)

历史与记忆——对二十世纪我们应记住什么?

乐黛云/[美]舒衡哲(71)

学者论坛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 [意]恩贝托·埃柯(83)

从《大汇篇》谈现代科学起源 陈方正(94)

超越术语 [法]阿兰·雷(104)

言与无言——如何面对语言遗产? 张世英(112)

中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进程 [美]林赛·沃特斯(123)

学术随笔

道家的玄思和先民的纺轮 庞朴(142)

文化沟通的障碍 [法]阿兰·雷(147)

学术动态

词与力——《关键词研究》项目概述 王 宾(150)

关于《关键词研究》项目的说明 [瑞士]瓦拉德·古德齐(153)

图书评论

中欧文化平等对话的一个范例

——重读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

钱林森(155)

书讯专递

欧洲文化:书目一百种

刘维荣 辑(165)

征稿启事

(177)

=====

寻求跨文化对话的话语

乐黛云

《跨文化对话》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近十年来欧洲和中国一群志同道合者的强烈愿望。

早在 1991 年 3 月，总部设在巴黎的欧洲跨文化研究院就曾以“文化双向认识的策略”为题，与中山大学合作，在中国召开了第一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 年 6 月，更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为题在北京大学召开；1996 年 6 月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文化的差异与共存”国际学术讨论会。几次会议虽然都很成功，而且也都出了中、外文版论文集，但大家总觉得意犹未尽，希望能有一个园地，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这方面的讨论。于是，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创办《对话》学刊的设想。同年 8 月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欧洲跨文化研究院三方就学刊的宗旨、组稿和出版进行了初步磋商。1997 年 5 月召开于北大的以“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为题的第四次跨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更明确地作了具体协商。当年 7 月在巴黎近郊的维拉苏古堡召开了中欧合作出版会议，确定了包括《跨文化对话》在内的一系列具体撰写计划。今天，在许多朋友的支持下，《跨文化对话》终于有了这样一个鼓舞人心的开始。

所谓“志同道合”者是指围绕这几次会议聚集起来的一批中国和欧洲学者，他们大抵不赞成在“全球意识”的掩盖下，实现所谓世界文化的“相互同化、融合、一体化”，认为这些说法多半只是某种“中心论”的变种。只有承认并保护文化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和发展自己。他们认为，目前，西方文化体系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系，一个“他者”，以便用一种“非我的”、“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设限”，寻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在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之后，也急需在新的基础上，在与西方的平等对话中，更新自己的古老文化传统，完成自己的文化现代转型。因此，东西方文化对话实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项重大历史要求。

两种文化的接触最便捷的方式是直接对话。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然而，长期以来，发达世界习惯于西方中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要以平等的心态去理解他种文化的陌生的话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是发达世界早已长期构筑完成的一整套概念体系，也就是一套遍及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长期占统治地位并被广泛运用的话语。事实上，这套话语经过数百年积累，汇集了千百万智者对于人类各种问题的思考，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然而，危险的是，如果第三世界只用这套话语构成的模式去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会因不能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排斥在外。由于这种矛盾，某些人就主张去“发掘”一种绝对属于本土的、未经任何“污染”的话语，但他们最后会发现这种话语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文化总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况且，即便有这样的完全“本土”的话语，它也不能为对方所理解而达到沟通的目的。

看来，要进行真正的对话，就必须找到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充分表达双方的独创和特色，并足以突破双方的旧体系，为双方提供新的立足点来重新观察自己，为“更新”和“重建”构成前提和可能。这个中介或许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无论不同的文化

体系多么复杂，无论人类多么千差万别，但从客观来看，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必然会面对许多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如关于未来和平发展的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还有“死亡意识”、“人类末日”、“乌托邦现象”、“遁世思想”等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文化体系的人们都会根据他们不同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当代人和当代语境的取舍与诠释，只有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多次往返对话，这些问题才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最圆满的解答，并向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景，在这一过程中，能够相互理解的话语也许就会逐渐形成。

这一辑《跨文化对话》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它首先汇集了1997年关于“未来十年中国和欧洲最关切的问题”的讨论，对话中心环绕着文化冲突、生物学发展与伦理道德以及电脑网络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等问题。此外，“学者对话”专栏中，有“如何面对人类的痛苦”和“历史与记忆”两个问题的对话。“学者论坛”方面，重新发表了Umberto Eco教授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共存》，这是他在过去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但仍然很有现实意义。陈方正教授的论文以中国为参照系讨论了何以现代科学首先发生在西方的问题。Alain Rey和张世英教授讨论了术语和语言遗产的问题。同时，我们在“学术动态”栏目中推出了中欧合作的重大项目——关于中欧“关键词”研究的计划。庞朴教授的《道家的玄思与先民的纺轮》是一篇富于睿智、极有趣味的短文，我们很希望将来能多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另外，法国汉学耆宿艾田蒲教授所写《中国之欧洲》的中译者钱林森教授写的关于该书的书评也很值得一读。

我们想做的事很多，我们的目标也很远大，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这毕竟是开始。

封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法]阿兰·李比雄

“天国和人间存在的东西远比哲学家所梦想的多得多。”

就是基于这一假想，国际跨文化组织创立了；为了阐明这一假想，《跨文化对话》应运而生。在欧洲文化的母腹中孕育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人类学——对人的认知，或说得更宽泛些，对人类自身和世界的一切知识，今天发觉自身正处在迈向新时代的边界上，这将深刻地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诠释方式。当前，欧洲人类学需要向其他非欧洲文化的认知方式敞开门户，赋予非欧洲文化以诠释的使命。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准备接纳新的模式，那些能够描绘未来世界的新的社会模式、知识模式。我们所要准备的是对世界的再次发现。

十年前，也就是 1987 年，一群欧洲、非洲和中国的学者认为，由于当今全球一体化和交流的迅猛发展，建立一种相互人类学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创建了国际跨文化组织，一个各国大学间的研究网络。它的主旨是开拓不同文明的互识道路，并通过了解非欧洲研究者对我们欧洲的认知，致力于涤清各种文化之间的误解，并在最适宜的相互观察的机制下创造发现对方的最好的相聚环境。

1988 年，我们和广东的大学的学者们就意大利社会这一人类学课题开始研究，时值中国开放发展，于是一个研究项目在欧共体

的支助下达成了。此项目以土地研究为主题,共举行了十几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6月,国际跨文化组织举行了一次巡回学术会议,探讨“‘普遍性’研究中的误解”,为期一个月,地点从广东到北京,取道丝绸之路,与会中欧学者们对各自的文化进行相互的认识和思考。(参看《独角兽与龙》,1996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从1994到1996年,中—欧又一项目:开辟经济新前景被提了出来,这促进学者和企业家人际网络的发展,使经济领域和学院研究领域联系起来,成立了中—欧企业家俱乐部。此次活动是在广东(1996年1月)举行的国际会晤中实现的,并创建了“中—欧无墙大学”。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些人定期出席,这得益于网络通讯的应用,并确保了交流的持续性。鉴于这种跨文化的前景,无墙大学应致力于建立一套灵活的思考和商谈的体制,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它能对各种文化模式为发展中—欧关系而相互碰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反应,并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接纳在创造未来中遇到的种种新情况和新模式。

问题的关键是中—欧文化各自与知识和科技的关系,更宽泛地说,就是文化行为对科技发展的影响问题。

三个世纪前,莱布尼兹(Leibniz)在《Novissima Sinica》(《中国的最新消息》,该书已于1992年出版中文版)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今天欧洲是如此腐朽败落,正需要中国向我们输送一批传教士教我们自然之道,就如当初我们派出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一样。”莱布尼兹三世纪前的真知灼见就已经和我们今天国际跨文化组织的宗旨不谋而合了。但也许得等到三百年后的今天,等到西方和欧洲混乱不堪,尤其是等到我们意识到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所说的“封闭的时代开始了”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莱布尼兹这一看法的现实意义。

对世界的局限(也就是瓦莱里的“封闭的时代”)的发现,也是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局限感的发现。只要还存在“一种物质”、“一小块”地方,“一个省份”是未知的,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就是只要还

存在一个“孤立人群”，我们就能在那里找到批判精神的用武之地，并在那里检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的正确程度。

但当我们达到这些局限的时候——这一临界线并不意味着一个未知世界的开始，而是意味着结论的循环，当我们行完了人类状况的各个不同阶段，而这些不同阶段被归为一个尺度，我们西方人于是一头撞进了虚空，撞进了纯工具化的人类学研究之中：我们孜孜不倦地以我们的尺度、我们的标准丈量周遭的世界，对参照物的普遍性深信不疑，对标准尺度深信不疑，而这些工具和尺度是我们自己在精神游戏、语言游戏中铸造的。就因为我们曾将它们施用于异国人群中，我们便以为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尽管未知的天地、未知的人类生存空间真实存在，我们自欺欺人地希望，一方面能证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认知方式、我们的科学的优越性，同时能展现普遍的特点——随着征服世界胃口的增大——科学的普遍性、对物质的衡量和认知、对人自身的衡量和认知。

当谎言编织好了，我们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竟然是我们自己，更确切地说是自身的投影和变形：这种变异被切切分分，用我们语言游戏的尺子去剪裁，用我们的秤、用我们的标准去称、去量，于是我们被恐慌和烦闷攫住了。怎么，多种多样的人就是这副模样？人根本就非多种多样，而我们所想象的普遍性只不过是相同手势、相同尺度的一成不变的重复而已。

“封闭的时代的开始”对人类学而言是否就是始于这种重复？我在其他的文章中也强调过，参观一个人种志博物馆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人类学研究所特有的剖析性质，亦即将人类状况细致分割，一方面是那种忧虑和烦恼，这是伴随人类学研究的一股有点罗曼谛克的怀旧情绪。

艾德曼·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几页题为《地球不转》的哲思中以悖论的形式指出，发现地球的转动和运行远没能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世界和人类状况，反倒更加深了我们观察世界视角的定势。由此尽管有过哥白尼的革命，我们西方世界在摆脱那种根深蒂固的本土意识上依旧表现得和以往所有人类社会一样无